

「英」哈罗德·金·菲尔比著 李惠明林地译 英石校

老书新刊之 谍战系列

群众出版社

谍海

余生记

菲尔比自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巨献

哈罗德·金·菲尔比著 李惠明林地译 英石校

新刊之谍战系列

LAOSHU XINKAN ZHI DIEZHAN XILIE



谍海

余生记

菲尔比自述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海余生记：菲尔比自述 / (英) 菲尔比著；李惠明，林地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5. 8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ISBN 978-7-5014-5400-6

I. ①谍… II. ①菲…②李…③林… III. 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0749 号

谍海余生记——菲尔比自述

[英] 哈罗德·金·菲尔比 著

李惠明 林地 译 英石 校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8.125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167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14-5400-6

定 价：29.00 元

网 址：www.qzCBS.com

电子邮箱：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老书新刊出版说明

群众出版社作为公安部所属出版社，新中国成立之前叫群众书店，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至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近五十部间谍题材的外版书，为读者较全面地了解神秘的间谍内幕和谍战经典战例提供了丰富史料，进而形成了群众出版社的出版特色。这批书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有些限定在内部发行，购买时要凭相关单位的证明和工作证。至今，仍有很多老公安政法干警记忆犹新，当时，为了购买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许多人在公安部8号楼排队一直排到长安街路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图书的名字与群众出版社密不可分，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近年来，随着谍战影视的热

播，人们阅读间谍题材图书的热情逐渐升温，图书市场上间谍题材的小说颇受读者青睐。但同时，也有一批读者渴望读到真实的纪实性谍战类图书。这类书由于多年未加印，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就连一些旧书网店都很难淘到。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群众出版社通过整理档案资料，首批出版“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七部。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自从决定出版之后，经过多方联系著者、译者及原出版者，由于时隔三四十年，始终没有音信，其间我们还求助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最终群众出版社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签订稿酬转付协议，望相关权利人或知晓线索人士与群众出版社联系。

群众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七月

内容提要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本人是英国人，早期就信仰共产主义，一九三四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一九四〇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并在该局得以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一九六三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苏联政府给他很高的荣誉，授予了“红旗勋章”。本书是菲尔比在苏联定居后写的回忆录，详述了他的间谍生涯，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内幕情况也有不少涉及，是一本较有价值的参考书。



谍海余生记

菲尔比自述

《谍海余生记——菲尔比自述》
群众出版社1984年出版

序

眼下的这本书，跟菲尔比的对头们所预想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是一本诚实可靠的书，富于文采，饶有情趣，他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出逃后的叙述，远比我记得的任何间谍小说更为扣人心弦。人们估计他在这本书里将会大搞宣传，但实际不然，除非把他对自己的信念和动机的庄严声明也说成是宣传。诚然，在菲尔比眼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去评判一下政治家们的行动，不论是迪斯累里还是威尔逊，都可以看出大多数搞政治的人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只不过不那么公开罢了。“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是的，他可能是背叛了，但是，在你我诸君之中，有哪位不曾对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事或人有过背叛行为呢？在菲尔比本人看来，他投身的是要改变现状以利祖国的事业。

正如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许多天主教徒曾为西班牙的胜利而



奋斗一样，菲尔比对于自己作出的抉择也是坚信不疑的。对于一个确定了自己的信仰就绝不因为遭遇人类错误观点带来的不公和冷酷而放弃它的人来说，具有这种狂热的信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宗教法庭横行的日子里，善心的天主教徒曾经以对未来的憧憬为慰藉而经受了多少磨难啊！错误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恶行，全然不能动摇他的信仰。如果今天还出现托克马达的话，那么菲尔比就会认为，有一天一定也还会出现一个约翰二十三世。菲尔比写道：“我在三十年代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许许多多的同代人也作了同样的选择。但是当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最严重的缺点越来越清楚时，他们中有许多人跑到另一边去了，而我却坚持不变。”他写了，并且也十分恰当地估计到了在鲍德温—张伯伦这样糟糕的时代，唯一的别的选择只可能是什么：“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会使自己沦落成为一个抱怨不休的政治弃儿，就像凯斯特勒—克兰克肖—马格里奇之辈一样，终日责骂那辜负了我的运动，埋怨那使我失望的上帝。无论这样是多么有利可图，看来也是一种可怕的前途。”

他对英国情报机关的描述是很逼真的。“我对自己轻易地被录用感到惊讶。后来我得知对我历史进行的唯一的一点调查，便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军事情报第五处，对方查了一番档案后告称：‘没有问题。’”（菲尔比当时要比我走运。警方有我的材料，因为在秀兰·邓波儿小姐控告我诽谤罪后，材料转到了检察长那里，调查结果被送交到秘密情报局局长本人）菲尔比甚至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进了秘密情报局。在他给苏联联系人

的早期报告中，他还倾向于认为自己进错了单位。

他对人的看法若说是不大宽厚的话，倒也是令人钦佩的。我不同意说这本书是别人捉刀的，这些东西只有菲尔比才写得出来。任何当时在第五科干过的人，都会同意他对他的科长费利克斯·考吉尔——菲尔比后来取代了他——的评价：“考吉尔对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还自鸣得意。他是那种把所有的对手都打入‘政客’之列的圣人。”他对副局长的描述也很真切：“如果说维维安确曾十分能干，那么这段历史也早就成为过去了。他身材细长，一头精心梳理过的卷发，眼睛湿润。”至于对局长孟席斯准将本人，虽然此人不大说别人的好话和爱摆点官架子而使别人不那么喜欢他，但菲尔比对他却出人意料地笔下留情。对于曾撬开了富克斯嘴巴的那位军情五处的审讯员斯卡登，菲尔比对他怀有行家对行家的那种尊敬。

如果本书需要一个副标题，我将建议它叫“间谍行家”。没有人比金·菲尔比当第五科的伊比里亚组组长更为称职了。他总是显得那样松快，遇事绝不惊慌。他干得比谁都起劲，从不让人感到他累了。当然，在那时，他跟同事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那种极度的紧张一定是后来在他成立新的单位来搞反俄国的谍报工作时才有的。但即便在进行这一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间谍行家的自豪感，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新单位搞得比东倒西歪的秘密情报局里的其他单位出色。“到了准备把最后的长篇大论的报告送交局长时，我们感到自己已经拿出了一幅像样的情报机关的蓝图，足以吸引有才能的年轻人以



此作为终身事业了。”于是，他小心谨慎而充满热情地投入干部招募工作。“重要的问题是在还有好干部的时候把他们抓到手里。当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已经在望的时候，解雇多余的人员要比找到今后一旦会需要的人容易得多。”这时，在苏联方面的联系人里已没有人怀疑菲尔比是否真正打入了该打入的单位。这是一种行家的自豪感，当然，还不止于此。只有一个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才能够测试出俄国情报机关的保安程度。这是一场令人目眩的大会战，虽然只有一方知道这其实是在打一场假仗。

关于他怎样搞掉了考吉尔而取得了自己的地位的叙述，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是“一段写起来别扭，读起来也别扭的插曲”。这话使人一下子感到了他内心中的无情之处。我亲眼目睹了此事的开始，其实作为他整个计谋中的一小部分，我还被提升了，但是我并未接受，反而辞了职。当时我只是把它看作个人的权位之争，我以为这是菲尔比为人的唯一瑕疵。现在我很高兴自己的看法错了。他是为事业而不是为自己，因此昔日我对他的喜爱之情又在心头重新燃起。我愉快地回忆起在圣奥尔本斯时期吃起来没完没了的星期日午餐，在他的带领之下，全组的人总要痛饮上几个钟头，然后晚上在圣詹姆斯街办公室背后的小酒馆里望着炉火再接着喝上几杯。如果有人出点差错，他总是大事化小，不加批评，结结巴巴地打个岔儿，遮掩过去。他给同事们帮了不少忙，但我们那时不会知道他在帮谁的大忙。

过了些年，当麦克米伦在下院宣布金没有问题之后，我和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正好去克罗伯洛，想起来该去看看他。长满杂

草的花园看不出有人管理的痕迹，也没人出来应门铃。在阿什当森林边沿，我们朝这个可怜人在萨里郡那杂乱无章的爱德华王朝式房子的窗子里看进去，只见邮件已经很久没人拾取，门旁地板上撒满了广告宣传品，厨房里有几个空的牛奶瓶，洗碗池里有一套用过的杯碟，看起来这儿更像是一个废弃了的吉卜赛营地，而不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的住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去了贝鲁特，也就是他去莫斯科——他从未到过的老家——前的最后一站。在地下待了三十年之后，他确实也该获得休息的权利了。

格雷厄姆·格林

自序

这本简短的书概略地介绍了我在情报界的经历。在适当的时候，我还将继续写下去。但在这次写作开始，我就必须要注意我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将一些被认为是从事机密工作的官员的姓名公之于世必然会引起本人的不快。我并不希望使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情报机构里的老同事们难堪，因为我对他们中的一些人仍抱有爱慕和崇敬之情。

因此，我尽量只提及那些据我所知已经去世或已退休的官员的名字。然而，要把事情讲清楚，有时不可能不提到一些仍在工作的官员。

对于那些我在后面提到了名字的官员们，我谨为我给他们造成的任何不快表示歉意。由于与秘密机构的联系，我本人也曾颇有为难之处。

一九六八年于莫斯科

前 言

我从大约五年前到达莫斯科起，就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这本简短的书。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时地征求朋友们的宝贵意见，有些我采纳了，有些我拒绝了。有一个被我拒绝的建议认为，为了使这本书更为生动，要我着重写从剑桥大学到莫斯科这段漫长道路中的风险。但我宁愿坚持讲真情实话。

当去年（一九六七年）夏天这本书暂时告一段落时，我曾长时间考虑过是否把它出版的问题，并再次向几位可以提出有益见解的朋友请教。他们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出版的问题应该无限期



搁置下来，我当时也同意这个看法，主要理由是出版此书可能会引起一场风波，再者，国际形势复杂，很难预料其后果。动手去做难以合理预知其后果的事情，看来是不明智的。因此，我决定压下自己的打字稿。

一九六七年十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上发表的文章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尽管这些文章与事实有些出入，并存在一些笔误（恐怕是为了有意夸大我的个人才能），但它们基本上是一幅我的生涯的真实写照。当然，那些与之竞争的报刊立即就指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已经成了一个大骗局的牺牲品。这种说法的荒谬性已由《星期日泰晤士报》揭露了。从我这方面来说，仅仅能补充一点：《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发表那些文章之前曾经要我审校稿子，但经过仔细考虑，我特意谢绝了。我认为编辑应该支持自己报社工作人员得出的结论，如果让利害关系这样深的我介入此事，容易使人们攻击这些文章的客观性。

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些文章彻底改变了形势。不管怎样，所揭露的事实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我们这些人。因此，我把我的书公之于众也就不致使人会指责我是想把水搅浑了。我的目的只是想纠正文章中某些有出入的地方和笔误，提供更完整的情况。

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严重危机的时间是很长的，那大约是从一九五一年年中到一九五五年年底。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坚信没有人能找出我与共产主义组织有任何联系，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在为我所信仰的事业工作的头三

十年里，我从一开始就处于秘密状况之中。这段漫长的生涯从一九三三年六月在欧洲中部开始到一九六三年一月在黎巴嫩结束。^① 从那以后我才能以苏联情报官员的真实面目出现。

直到最近《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披露了一些非常重要而真实的机密之前，有些曾在报刊、书籍中写到过我的情况的作者一直是在胡言乱语。但不应该指责他们的无知，因为我在一生中一直注意不宣扬事情的真相。他们应受批评的地方或许是在他们急于得意扬扬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坚持用复杂的说法来解释可以简单说明的事实。当然，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一个正在瓦解的权力机构及其大西洋彼岸的朋友们来说是惨痛的。但是，任何想用文字来抹杀这个事实的尝试，无论是有意或无意，都是无济于事并且注定要失败的。

在中欧搞了大约一年的非法活动后，我回到了英国。正当我该自己开始谋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事情。几周内我和所有政治上的朋友都断绝了来往，开始经常去德国大使馆。我加入了英德联谊会，并为了一项没有成功的事业干了许多跑腿的活，就是用纳粹的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② 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这次奇怪的冒险还是失败了，因为另外一个组

^① 离开剑桥大学时菲尔比已是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到维也纳参加过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反对政府的斗争。一九三四年他在维也纳与一位叫丽希·弗里德曼的共产党员结婚。——原出版者注

^② 菲尔比是在掩盖他早期热衷于共产主义的迹象。伯吉斯也是该联谊会会员，他的做法显然同菲尔比完全一样。——原出版者注



织抢在了我们的前边。但在商谈过程中，我曾几次去柏林找过宣传部和里宾特洛甫情报处。迄今还没有人说过我曾由信奉共产主义改信纳粹主义。这里的简单和真正的理由是当时苏联政府很注意英德两国公开和隐蔽的联系。

一次我正访问柏林时，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纳粹分子都趾高气扬，而我直到返英之后才得知佛朗哥将军并没有接管整个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在眼前。我的下一个任务是去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目的是尽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长期潜伏下去。这个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在几个星期之内，我就成了《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军队的正式随军记者，并以这个身份经历了这场悲惨战争的全过程。这次还是没有人提出我因此而成为佛朗哥分子。理由仍然很简单，是苏联让我去那里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正当战争的风云在但泽上空迅速聚集时，《泰晤士报》要我撇开西班牙，做好到任何可能派往西线的英国部队中的准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我最希望得到的美差了。随便哪个有钻研头脑的战地记者都可以积累大批新闻检查部门不准发表的情报。而且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已经教会我如何提出巧妙的问题。后来，英军司令部设到离巴黎不远的阿拉斯。我的大部分周末都是消磨于在那个都市里出没的隐姓埋名者中间的，而并不是像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在那里追求女人。尽管我在阿拉斯的职位不错，但它并非十分理想。我的苏联朋友一再催促我说，我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十月初记者团去法国之前，我曾许多地方放出过一些风声。当时我能做的